

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

从雅尔塔到越南

[美]戴维·霍罗威茨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

从雅尔塔到越南

〔美〕戴维·霍罗威茨著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DAVID HOROWITZ
FROM YALTA TO VIETNA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Penguin Books Ltd., Middlesex, England 1969

根据英国米德耳塞克斯企鹅丛书公司1969年版译出

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

从雅尔塔到越南

[美]戴维·霍罗威茨著

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312,000

1974年1月第1版 197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 3171·83 定价: 1.05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戴维·霍罗威茨是美国旧金山出版的《堡垒》杂志的副编辑，曾在英国、瑞典等国求学和工作。本书就是作者在国外时撰写并在英国出版的一本著作，1965年初版，1967年和1969年又两次以袖珍普及本形式再版。

全书分三篇，共二十六章，叙述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二十年中推行的“冷战”外交政策的来龙去脉和执行情况。在第一篇中，作者着重分析了“冷战”的起源，阐明了美苏从战时的盟国关系转变为战后敌对关系的责任在于美国。在第二篇中，作者着重讨论了美国作为“世界范围内看守既得利益的警察”，敌视中国革命，侵略朝鲜和越南，在世界各地进行颠覆的种种活动。在第三篇中，作者分析了美国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各个时期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各种因素，还讨论了美国“冷战”政策怎样导致柏林“危机”、核竞赛、古巴“导弹危机”等一系列“紧张局势”，并鼓吹要从“对抗”转向“谈判”。

作者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来阐述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但作者提供的一些资料，可供有关同志研究美国战后外交政策时批判参考之用。

原著每篇前都有大事记，时间交错，我们为避免内容重迭，就原有材料编成一份大事记，作为附录；原著还有注释约七百余条，大部分是注明作者参考使用的书刊和报纸资料的来源，我们从中选择了一部分作为脚注译出，一并供读者参考。

1973年7月

序 言

一切战争都会制造出一些为自己辩解、把自己说成不朽的神话。冷战也不例外。两大阵营内的公众意识，长久以来都早就为一些历史传奇所支配，这些历史传奇给各自一方的主要行动赋以不容争议的正直性，并把自己一方的事业说成是全人类的事业。

自然，一个阵营的神话只有在另一个阵营的人们眼里才较有可能还其本来面目；在自己一方看来则始终是真理。在这种情况下，两个阵营的历史学家们就可能成为从“内部”来弄清事实真相的旗手，这较之仅作学术研究要重要得多。因为，人们正是利用了这些神话，在自由的名义下行镇压之实，在和平的名义下使冲突长期继续下去。而且，如果不能以比较接近事实的叙述来代替二十年冷战中散布的那些神话，看来美苏关系缓和所提供的机会很可能会白白浪费掉，而和平的前景也将变得暗淡。

正是那些历史学家们才有机会在不同程度上接触到一些历史资料，只有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料来清除那些虚构的故事并为建树真正的公平和真实的和解准备基础。而且，这样的资料在西方最容易取得，而对历史进程这样作出重新估价，也是在西方最能迅速产生效果。美国在1962年古巴对抗期间所采取的姿态，也许最能说明为什么这样的努力在西方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1962年10月23日在国际局势严重危险的时刻，艾德莱·史蒂文森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表演说。那时美国刚对古巴共和国实行海军封锁，企图以此促使苏联撤走设在这个岛上的导弹。美国采取这一行动，既绕过了联合国，也违反了以和平协商解决争端

的这一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

因此，史蒂文森的演说是企图解释和辩护美国所采取的行动。为此，他回顾了冷战历史，力图表明是俄国人一直从事破坏联合国宪章所设想的世界秩序——因此得出结论说，不能总是在联合国宪章的体制内对付他们：

“纪录具在：条约、协议、保证以及国际关系中的行为准则，都从未能阻止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行动。……没有人怀疑赫鲁晓夫主席已在苏联改变了许多事情。……然而，有一件事他却未曾改变——那就是，苏联的基本努力方向是要破坏联合国宪章所设想的那种世界，要毁灭想建立一个多样化的世界秩序的那种希望。……

……世界至今还未曾见到……苏联外交政策有什么变化。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使世界笼罩着阴影的就是这个问题——它使我们对和平与进步的希望暗淡下去，它迫使那些决心保卫自由的国家采取行动进行自卫。在这方面，领导责任不可避免地大都落在美国肩上。”

因此，在史蒂文森看来，苏联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和平与进步的希望暗淡下去”这件事单方面负责。同时他把美国自己说得好像同苏联刚刚相反：

“针对苏联无情的扩张主义，我们曾采取了各式各样的行动。

我们忠实地力图支持联合国，效忠于联合国宪章所设想的世界，力图建立一个用行动而不是用空谈来争取和平的切实可行的制度。

我们从未拒绝谈判。我们参加一个又一个的会议来为危险的冲突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

当然，史蒂文森的这番话可以仅仅看作是政治事务中常见的那种外交词令的又一个例子，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律师为其诉讼委托人所做的案情概括说明。但是，当世界摇摆于核灾难的边缘之际，他在国际舆论的大讲坛上发表这样的演说就带有格外重大与深远的意义：这些话构成了美国政府为其危及世界文明前途的

冒险行动辩解的理由,因而也就体现了美国冷战政策的实质。

没有疑问,大多数美国政界领袖和大部分美国公众都是同意史蒂文森关于冷战的争端及其起源的说的。因此,稍稍考察一下史蒂文森为美国在古巴危机时期的行动辩护的主要论点,即美国从不拒绝同顽固而作梗的苏联谈判,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有必要写这本书来研究冷战时期的美国政策。因为,在历史事实面前,史蒂文森的说法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首先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1945年11月单方面中断三大会会议从而使美苏国家领导人之间十年没有会晤的是杜鲁门总统而不是斯大林。1950年,否决邱吉尔等提出的由杜鲁门和斯大林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的提议的,又是美国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而当时苏联独裁者是表示愿意参加的。但较之这些特殊事件(这类事件不胜枚举)^①更为重要的,是冷战关键性的几年中(1947年及以后)美国外交政策所依据的基本前提:

“〔国务院〕^②关于苏美关系的哲学和整个杜鲁门主义都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不相信这场冷战所涉及的争端有解决的可能。……〔国务院〕已得出结论: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设法‘遏制’俄国,直到俄国发生变化、不再是我们的敌手而成为我们的伙伴时为止。

据我看来,这个结论是没有根据的。一部外交史历来就是敌对大国之间关系的历史,这些大国之间并不存在政治上的友谊,也并不具有什么共同的理想和目标。然而,它们之间的一些问题还是解决了……

① “在美国和俄国两者之间举行会谈,长久以来就是克里姆林宫政策的一个目的;而避免两者之间的谈判则是我们的长久以来的目的之一。”(见艾尔索普兄弟的文章,载于《纽约先驱论坛报》,1949年12月12日,转引自D.F.弗莱明的著作:《冷战及其起源》,1961年版。D. F. Fleming: «The Cold War and Its Origins, 1917—1960», 2 vols., New York, Doubleday, and London, Allen & Unwin, 1961.)

② 这段文章引自沃尔特·李普曼对乔治·凯南署名“X”的文章的批判。凯南是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的主席。

那种认为敌对的和不太友好的大国之间不能达成和解的想法是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①

1952年共和党人接替民主党人当政后，美国外交就由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主持。此人一贯反对谈判解决问题是臭名昭著的，不必在这方面多费笔墨了。

因此，不仅史蒂文森大使对美国在冷战中的基本态度所作的描绘是极为错误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古巴危机期间所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在美国的冷战行动中是有代表性的，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外。的确，如果美国真象史蒂文森所断言的那样是一贯按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行事的，那末在导弹危机之前的两年里就不会对古巴实行禁运，就不会拒绝谈判两国间的分歧，也不会资助和鼓动对古巴的破坏性袭击和策动古巴流亡分子的大举入侵。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根本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而且，不管怎样判断苏联的动机，总不能说古巴采取过任何这一类行动来反对美国。

美国所作自我评价的不符合事实，不仅仅限于是否愿意谈判或者是否遵守国际法等方面，也不仅仅限于美国代表在联合国的发言。在1960年竞选总统时，已故的约翰·F·肯尼迪声称：“美国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我们对维护全世界的自由负有责任。”

一年后，卓越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在美国作了一系列学术演讲，对这种见解提出了激烈的异议：

“……今天美国是全世界范围内保护既得利益的反革命运动的领袖。它现在所扮演的正是昔日罗马帝国所扮演的那种角色。罗马在它势力所及的一切外国中，一贯地支持富人，反对穷人；由于不论何时何地

① 沃尔特·李普曼：《冷战》，纽约哈珀公司和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公司1947年版。（Walter Lippmann: «The Cold War», New York, Harper, and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47.）

穷人总是要比富人多得多，罗马政策的后果就必然是更多的不平等、不公平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痛苦。如果我的估计是正确的话，我可以说美国是蓄意决定要仿效罗马所担任过的角色的。”^①

肯尼迪和托因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大多数美国人（也许还可以说大多数西方人士）是会觉得难以协调的。两种说法间的巨大差异如果不是单纯由于情报缺乏，那一定是由美国冷战逻辑所依据的那些神话所造成的。本书的希望，就是通过揭露西方冷战神话的虚构性，来为比较正确地理解冷战年代中美国所担任的角色打下一些基础。

肯尼迪和托因比这两种对世界形势的相互矛盾的看法为我们的研究计划提供了一个适当的起点，因为它们以抓住事情本质的方式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存在——即使不是对于它的重要性——西方观察家是已经普遍承认的了。这个问题就在于：美国在西欧的冷战政策和美国在不发达世界（也包括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扮演的角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因为，在西欧美国还能够把自己说成是支持经济重建和保卫民主社会的，而在不发达世界里，则简直没有什么例外，美国总是把它巨大的力量用来支持那些甚至对最低限度的社会进步和改革都要抗拒的残暴独裁政权。^②

这些事实所提出的矛盾，通常是以不发达地区的“落后”作为

① 阿诺德·托因比：《美国和世界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1 年版。（Arnold J. Toynbee: «America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② 就在 1960 年当肯尼迪公开声称美国有责任维护世界自由的那个时候，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对维持西班牙、土耳其、泰国、台湾、南越、南朝鲜和巴基斯坦的独裁政权正起着也许是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对于伊朗、沙特阿拉伯、黎巴嫩、摩洛哥、南非、尼加拉瓜、巴拉圭和海地等其它独裁政权和警察国家也是重要的施主。而美国自己在广岛投掷原子弹后的十五年和缔结对日和约后的八年，还在对冲绳及其附近岛屿行使军事独裁。

理由来敷衍解释过去的；据说，在美国保护下这些地区到处出现的反动独裁政权的真实根源就在于它们所处的“落后状态”。且不说这种论点的出发点和它的根本态度都是有问题的，显然也不能够用这些地区本身的“落后”来为美国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中的所作所为（使托因比的论点得以成立的那些罪证）辩解。

例如，美国应对 1954 年在南越成立吴庭艳反动政权一事负责，这是人所共知、绝无疑问的。吴庭艳这个独裁者，不是人们加给美国的一个负担，而是由美国政府自己选中的。吴庭艳用残忍手段对付反对他的民主势力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不但得到美国的认可，而且正是由于美国的支持，他才有这样做的可能。^①

1957 年当吴庭艳脱离越南人民的事实已引起人们的注意时，保守的《经济学家》周刊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写道：

“……吴庭艳的问题在于他不是一个仅仅得到西方帮助的领袖；他是西方一手创造出来的。保大皇帝任命了他，但这只是一个形式。选中他并把他安插在领导地位上的是皮杜尔和杜勒斯。在宣传战中双方经常使用的那个不受人欢迎的字眼‘傀儡’，对吴庭艳来说是千真万确的。……他有过几次违抗西方的劝告行事，并不能说明他不是傀儡。”^②〔着重号是原有的。〕

一个甚至更加意味深长的例子或许是危地马拉。因为，结束危地马拉十年无间断的民主统治的不是它本身的“落后”，而是美国策划的政变。在政变后的十一年中，实际上一直是由危地马拉的陆军统治着这个国家，首先是通过一个独裁政权，接着是通过操纵选举，1963 年春天以后则由一个军人集团组织政府，美国对于

① 参阅本书第九章。

② 见戴维·霍瑟姆的文章，收在林德霍尔姆编：《越南的第一个五年》，美国密执安大学出版社和伦敦安格斯·罗伯逊公司 1959 年版。（R. Lindholm ed.: «Vietnam: The First Five Years»,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and London, Angus Robertson, 1959.）

这三者都给以承认并用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给以支持。

由上可见，本书的研究任务在于回顾冷战时期美国的主要行动（从罗斯福逝世起，到肯尼迪逝世止），并把这段时期的历史所产生的某些较为重大的问题提出来。特别是要阐明，上面提到的两个例子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美国在不发达地区一贯政策的部分表现。还要阐明，这一政策也是同美国在欧洲的政策（特别是美国的反对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联系着的，并且不管表面上如何矛盾，美国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同它的欧洲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此，本书的第一篇是欧洲冷战形成时期的一个历史叙述，这是同传统的叙述很不相同的。同时也考查一下，通常那种把美国政策看成主要是苏联无情扩张所引起的反应的看法究竟是否符合事实。第二篇是依次写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一些主要的冷战行动，从朝鲜战争到反对古巴革命，借以说明托因比论点的正确，并着重指出美国的政策是同人们通常认为的它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最后，在第三篇中，对造成这些事态发展和导致冷战现状的主要影响，即战后美国在对苏方针上和对待欧洲分裂问题上的态度的演变，作了一个扼要的回顾。只有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本书三部分的研究结论综合起来，来证明美国冷战外交政策的内在一致性。

在第三篇的分析中，还考虑到了原子弹和继之而来的其他核武器的这一因素。这个因素对冷战的进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可是过去还从没有就它在决定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作过充分的论述。的确，这些武器的发展这一事实本身，它们威力的巨大变化和它们数量的增长，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个认识到这个因素的全部影响并加以分析的作者是P·M·S·布莱克特。他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盟国防务的贡献而被授予美国勋章，也是诺贝尔物

理学奖金的获得者。他在 1948 年发表了一部杰作叫做《原子武器的军事和政治后果》，后来还曾继续就这一重要题材写过几篇值得称道的文章。

1948 年以来的技术进步，继续推动着新的军事威力和新的战略的发展，并改变着政治形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1957 年的发射人造卫星。此事戏剧性地显示了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的能力，也表明美国本身从此也显然成为易受袭击的国家了。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把研究这些战略发展所得出的结论同冷战外交的历史结合起来考察（布莱克特就曾主张该这样做）。从本书第三篇对于遏制政策（1947 年）、脱离接触政策（1957 年）和古巴危机（1962 年）的分析中，就能够体会到这样结合起来考察有深远的重要性。不管这些分析是否正确，有一点总是明显的，即如果不懂得当前的核问题，就无法充分理解世界形势的重要演变。

在本书试图论证的各点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正是以往研究冷战的著作中几乎完全忽略的一点，那就是：战后初期的国际力量对比使美国在确立战后国际关系结构的战略性决定方面处于近乎垄断的地位。^①与此相反，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们则由于国际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只能采取一些基本上只具有战术性意义的行动，不管这些统治者的长期意图是什么。

这并不是说苏联的行动对于冷战的进程没有重大影响。也并不是说美国领袖们在选择战略性政策时拥有无限的机动权。主要

① 举例说，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是唯一的强国，能够在经济上支持建立一个联合国管理下的国际开发机构，有了这一机构，能使发展中国家不必因接受附有政治条件的援助而被迫参加当时的某一大国集团。缺少这样一个机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决定战后时期国际关系的结构，并不可避免地使冷战侵入“第三世界”。问题在于目前世界经济力量的分配状况给予美国，而且是仅给予美国，以产生或制止产生这样一个机构的战略选择权。美国反对设立联合国经济发展特别基金（SUNFED）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决定，其他大国是无力作出这种决定的。

的政策一经被采用，往往它本身会产生出一种推动力。例如，在杜鲁门政府的欧洲战略所造成的政治气氛下，就形成了一种压力，使这个政府后来在 1950 年不得不改变它的对华政策（参阅第七章）。

我试图说明的是，冷战之作为冷战，确定它的格局的是华盛顿在 1945—1947 年期间所作出的一系列政策决定，也就是“典型地”表述为杜鲁门主义的那些政策决定。这也就是说，如果举例来说，华盛顿当时采用了李普曼的战略性政策建议而不采用遏制政策，那末可以肯定（在所有这些假设的限度内），欧洲在今天就不会再是分裂的了。而且，在作出杜鲁门主义所体现的那些重要战略决定的那个时候，所谓苏联扩张的压力只能是采用遏制政策的一个借口而不是决定这种政策的原因（李普曼能够提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政策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最后还要指出的一点是，苏联由于力量对比处于软弱地位——不管它的长期意图如何——自己不可能冒险地采取行动，否则会引起美国作出它的遏制政策所规定的报复行动。^①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说美国决策人在战略上有可供选择的回旋余地，而他们的克里姆林宫对手则没有这种回旋余地。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由于本书研究的范围是从雅尔塔时期和战时联盟的解体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的美国政策之间的关系（不仅是雅尔塔会议以前和以后的美国政策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没有交代得很清楚，因而也许有容易引起误解之处。1945 年春美国政策确实有过一个变化（象本书中所指出的），对这一点我想不会再有多大疑问了。但在另一方面，因为随着德国的战败和原子弹的发展，政治力量的形势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就不可能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去阐明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与战前“新

① 关于斯大林意识到苏联的软弱地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谨慎小心等方面的证明，可参阅本书第五章附注。

政”时期和更早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可以阅读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的悲剧》（1962年版）和劳埃德·C·加德纳的《从经济角度看新政外交》（1964年版）。这两本书令人信服地证明战前和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有着基本的连续性，两位作者都认为冷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苏联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出现而使国际形势完全改观的情况下，美国处理外交事务的方针和态度却仍是传统的老一套。

在下面各章中我引证了许多作者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看法，应该感谢他们，那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特别提一下 D·F·弗莱明对我的帮助，因为他在《冷战及其起源，1917—1960 年》一书中对冷战的过程所作的细致叙述对本书的构思设计是不可或缺的。

目 录

序 言	1
第 一 篇 盟国变成敌国	1
引 论	2
第 一 章 美苏磨擦和联合国的创立	7
第 二 章 新老美苏关系	19
第 三 章 联盟的瓦解	30
第 四 章 希腊的内战	43
第 五 章 冲突公开化	47
第 六 章 重新评价	63
第 二 篇 自由世界的领袖	75
第 七 章 遏制阴谋	76
第 八 章 遏制转变为解放：朝鲜	91
第 九 章 干涉越南	119
第 十 章 危地马拉的政变	141
第十一章 对早期遏制政策的回顾	164
第十二章 反对古巴革命	175
第十三章 美国和世界革命	189
第 三 篇 千钧一发的局势	217
I. 遏制和解放	218

第十四章 欧洲的分裂·····	218
第十五章 原子弹·····	239
第十六章 东欧：1949—1956年·····	255
II. 痛苦的重新估价·····	268
第十七章 李普曼，凯南和人造卫星·····	268
第十八章 教条和撤军·····	278
III. 艾森豪威尔年代·····	296
第十九章 缔造和平的失败·····	296
第二十章 最高级会议的垮台·····	304
第二十一章 核战略和导弹差距·····	312
IV. 肯尼迪年代·····	322
第二十二章 创造实力地位·····	322
第二十三章 推翻力量均势·····	335
第二十四章 摊牌：古巴危机·····	348
V. 缓和及以后·····	364
第二十五章 核休战·····	364
第二十六章 美国冷战政策的一致性·····	374
附 录：大事记(1945—1965年)·····	400

第 一 篇

盟 国 变 成 敌 国